



中国乡村研究

(第三辑)

黄宗智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乡村研究

(第三辑)

黄宗智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

主 编 / 黄宗智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编辑 / 章绍武

责任校对 / 枣 栗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艺苑印刷厂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3.5

字 数 / 329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543 - 1/K · 132

定 价 / 3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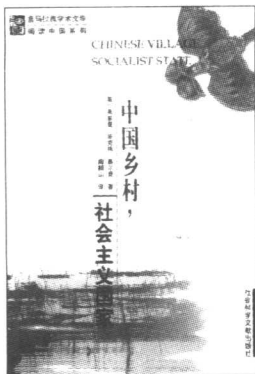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ca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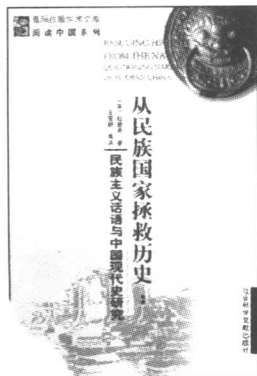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美] 毕克伟 等著

2004年5月出版 26.00元

ISBN 7-80149-669-8/K·092

本书系统探讨了中国河北饶阳县五公村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1960年的发展变迁，分析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及革命胜利后在农村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从减租减息到互助组、合作社，再到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以及这些先后进行的改革对农村社会及农民的影响，对战争及国家的作用，它们与传统文化间的关系等问题，并进而探讨国家与农村社会，国家领导与地方干部的关系。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美] 杜赞奇 著

2004年5月出版 20.00元

ISBN 7-80149-845-3/K·124

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审视近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社会制度等诸多因素于一体，尤其作者提出的“复线的历史”的观念，对于拓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深化对近代中国史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

主 编：黄宗智

编辑委员会：

孙立平 陆学艺 陈春声

张 静 阎云翔 秦 晖

黄宗智 龚启圣 景 军

执行编辑：

应星 (yingxing@publica.bj.cninfo.net)：人类学、社会学、法学

夏明方 (xiamingfang2@vip.sina.com)：历史学、政治学

彭玉生 (yushengpeng@yahoo.com)：社会学、经济学



CONTENTS

环境、市场与农民选择

——清代及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生态关系 …………… 张家炎 (1)

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育性质新探

——与江南的比较 …………… 夏明方 (38)

冀南农民家庭子女数量变动考察：

1930~1990年代 …………… 王跃生 (100)

图像再现与历史书写

——赵望云连载于《大公报》的农村写生通信

…………… 曾蓝莹 (152)

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

——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

话语—历史矛盾溯考 …………… 李放春 (231)

村庄的家族政治：权威、利益与秩序

——华西村个案研究 …………… 周 怡 (293)

宗族对乡村社区公共权力的影响与作用

——从江西省 XJ 县 40 个村的调查看宗族与

村级公共权力的构成和互动 …………… 刘良群 (343)

王权神话与生育仪式

——一则大理神话与朝圣之间的结构关系 …… 梁永佳 (387)

环境、市场与农民选择

——清代及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生态关系*^①

张家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

一 引 言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总体上由阶级斗争学说与市场经济学说主宰。1950~1970年代主导农民、农村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根据这一学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村仿佛充满了受尽压迫与剥削而被逼揭竿而起的农民。1980年代初以来流行的则是市场经济学说。在这一学说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仿佛都是受利润驱使、想尽办法挣钱的理性投资者。前一种学说明显是受到了当时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后一

本文由笔者在 UCLA 写作研究班的一篇论文发展而来，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一直得到黄宗智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忱。同时非常感谢两位评审人艾仁民博士与夏明方教授仔细的阅读与犀利、中肯的修改意见。但文中存在的任何观点与事实错误概由笔者负责。

① 文中江汉平原范围大致相当于清末的荆州府（不含宜都）、汉阳府（不含黄陂）、安陆府、荆门直隶州（不含远安）及武昌府江夏县。由于1949年以来这些政区的名称与辖区频繁变更，行文中行政单位名称除洪湖（1951年建县）外基本上指清及民国时期，没有改成现今采用的新名。

种思潮则与1970年代末农村改革以来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不能否定，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不断的农民起义，也存在蓬勃发展的农业商业，但造反、逐利毕竟只是农民中的部分或他们的部分特性，他们中的多数及农民的主要特点还是力图适应当地环境而生存的劳动者。

阶级斗争学派因为意识形态太浓而在中国学界日趋沉寂，市场经济学派却不断普及并逐渐形成其主导地位。在小农研究领域，这一学派以舒尔茨理性小农的理论影响最为广泛。按照他的说法，为适应市场刺激与机会，农民会寻求最大的利润。为此他们会最有效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Schultz, 1964: 36~48）。换句话说，市场决定了传统农业中资源的最理性运用，而农民表现也像资本家一样理性。他承袭的是亚当·斯密的理论，斯密认为市场竞争与个人追逐利润相结合会导致劳动分工及生产专业化，并反过来导致资本主义发展（Smith, 1976 I: 7~16）。他们两人都认为市场刺激是农村转变的主要动力（黄宗智, 1992: 8）。

然而斯密与舒尔茨都忽视了环境因素。斯密考虑的是稳定环境条件下可利用资源的使用，他没有考虑不确定环境条件下对这些资源利用的可能变化。舒尔茨则干脆撇开环境因素，他甚至把那些受到水旱灾影响、有新建大坝的社会排除在其考虑之外（Schultz, 1964: 37）^①。但在理解、研究传统农业时，我们却不能无视环境的作用。即使现在，农业生产仍受到不稳定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这与在可控条件下进行的工业生产完全不同。在舒尔茨看来，传统农业社会也是一个没有人口压力的社会，“所有想要和能够胜任工作的劳动力都得到了就业”（Schultz,

^① 诚如吴承明指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吴承明，2001: 21）但既然水灾是影响江汉平原农业生产的极重要因素，在我们的分析中就无法将其忽略。

1964: 40)。但明清以来的中国农村并非如此。

因此，这一解释受到夏明方的强烈批评，他认为斯密、舒尔茨以及那些利用他们学说的中国学者把前工业社会的农村经济浪漫化了。他特别批评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环境变迁（特别是自然灾害）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认为自然灾害在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如民国时期华北农村不确定的环境条件迫使农民选择粮食生产以确保生存；在高度的生存压力下（人口压力加上缺少生存资源），贫民也会冒高风险卷入市场以追求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回报。他认为这才是农村商业化的真正动力（夏明方，2000a）。

夏的批评代表了中国学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重视环境因素的趋势^①。在西方的中国小农经济研究中，这一趋势早就出现了（黄宗智，1986、1992），而且也表现在广义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裴宜理，1980；周锡瑞，1987；濮德培，1987；Schoppa，1989等），并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保护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等的影响下显得更加突出（伊懋可，1993；奥思本，1994；伊懋可、刘翠溶，1995^②；马立博，1998；彭慕兰，2000）。

这些研究虽均重视环境，但各有侧重，或把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放在一定的环境中理解，或以环境变化为重点，从此出发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虽然研究者们已开始倾向于把环境变化置于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综合研究（如伊懋可、刘翠溶，1995），但多是从国家或精英角度自上而下地看环境的变化，很少从农业生产或农民的角度看环境变迁。此类研究的另

① 近年来对中国环境史（特别是自然环境的历史变迁）的研究可见张国旺2003，把环境置于社会经济大背景中研究的例子则有复旦大学史地研究中心2001等。

② 此乃1993年一次中外学者（以西方学者为主）研讨会的论文集，中文版于1995年出版，英文版于1998年出版。因英文版中所选论文作者多为西方学者，本文在这一意义上将其纳为“西方”作品。

一普遍现象是不在意区分环境与生态，往往是两者通用，而且所谓的环境或生态危机往往指的是资源危机，即因人类活动造成某种资源（如土地、燃料、水等）缺乏所形成的危机，有的因此把环境（生态）因素拔高到经济发展的单一决定因子（如彭慕兰，2000）。笔者赞同黄宗智先生将环境与生态分开考虑的做法，环境主要指地形、地貌、水系、土壤等自然条件，生态则包括环境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经济结构与人类活动。这种体系定义为生态系统，其中环境与人及社会经济结构间种种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则定义为生态关系（黄宗智，1992：21；参见吉尔茨1963：3）。因此环境及其变化只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还得同时考虑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经济结构间的种种复杂关系，特别是人在其中的作用，人类活动毕竟是改变环境的主要因素。

本文即以清及民国时期的江汉平原为例来探讨此种生态关系。近20年来的研究表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明清时期农村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表现为纳移民、垦垸田^①、输米粮等。在这一湖泊密布、河流众多的地区，以筑堤围垸为主的水利工程显然在当地明清经济的发展中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与朝代循环大致同步的水利循环，亦即朝代之初政府鼓励垦殖，水利工程亦运行良好；但大量筑堤围垸也引发不断增加的水灾。而随着朝代的衰退，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亦减弱，水利失修、经济衰退；等新的朝代建立之后又开始新一轮循环（濮德培，1982、1987；魏丕信，1985；张建民，1987；张国雄，1989；彭雨新、张建民，1992；梅莉等，1995）。

其中江汉平原从清中期起，除不断围垸外，大量接纳移民、

^① 根据梅莉等的定义，“垸田是两湖平原河湖交错的水乡地区一种四周以堤防环绕、具备排灌工程设施的高产水利田。垸堤、涵闸、渠系是判别本地区垸田的必备的条件”（梅莉等，1995：91）。也就是说作为垸田的基本条件乃是外围有堤、堤上有涵闸、堤内则有灌排渠道。

大量输出米粮的特征却不见了。由于人口增长，更多的垸被开垦，这又加重了围垸所引起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洪灾更趋频繁而渍灾^①更严重，这些直接导致当地经济状况的恶化（张建民，1987；龚胜生，1993；张国雄，1995）^②。明清不断增加的洪涝灾害同时影响到江汉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粮食生产高产但不稳产、地籍混乱与修防负担沉重（张建民，2001）；以及堤垸社会的形成与社会冲突加剧（张修桂、左鹏，2001）等。虽然这些研究注意到了江汉平原在人口压力下从过度垦殖到环境恶化再到经济恶化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多侧重于宏观变化而对农民本身的反应注意不够；虽然水利兴废与朝代更替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但农民种什么作物并不一定受改朝换代的影响。而且他们的环境（生态）变迁显然主要指的是筑堤围垸所引起的自然环境变化及这种变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而对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经济结构及种种生态关系的分析显得不够，特别是没有深入探讨环境变迁与市场变化在小农经济中的作用以及面对变化的环境与市场农民所采取的经济行为。农民的行为如何受到变化着的环境与市场的影响？他们如何及为什么做出经济决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经济行为是否符合舒尔茨及不少研究者视为理所当然的市场逻辑？

① 渍灾通常表示地下水水位太高以致作物根系总是浸在水中（即使常规水稻其根系也不能总是浸在水中）。作物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会死，但收成肯定受影响。

② 这种纳移民、增垸田、增水灾的现象在相邻的洞庭湖平原也同样存在（濮德培，1987；梅莉等，1995；龚胜生，1996等）。其中濮德培的研究是迄今为止对明清洞庭湖平原经济变化研究较为全面、也是惟一的英文专著。他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洞庭湖平原从明中叶至19世纪中叶人增、垸辟、农业增长与生态恶化的过程，并指出中国19世纪的危机其实在18世纪就已埋下种子（濮德培，1987）。虽同属长江中游平原，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仍有差别：洞庭湖区没有沿江大堤；其开发比江汉平原稍迟（尤其在20世纪初又出现一次新的垦殖潮）；洞庭湖平原以水稻生产为主，而江汉平原旱兼作明显等。

按照舒氏逻辑，自清中叶起，由于当地垸田的大量增加以及全国范围市场粮价的上扬，江汉平原应该继续生产并出口更多的稻米。即使由于人口压力而显得土地日益稀缺，当地老百姓也应转向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明清以来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的生产并大量织布输出，但这并没有在江汉平原出现。虽然该地区也有种植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的悠久历史，且棉花在各县均有种植，但在清前期水稻生产达高峰之后，江汉平原并没有转向以棉花生产为主，也没有出现曾在江南普遍的棉争稻田、纺织业市镇繁盛的现象，反而在民国初期却出现棉花种植的急剧扩张。

由于舒尔茨强调的是农民经济中市场的万能而忽视了长期的环境变迁，而考虑江汉平原长期环境变化的学者们又对不断恶化的环境条件下当地人的农业经济行为重视不够。因此两者均不能完全解释江汉平原这一存在长期水利问题的地区在清代及民国时期的经济变化。本文因而试图主要从作物选择与家庭纺织业生产的角度出发考察江汉平原农民在人口压力、环境恶化及市场扩展情况下的经济行为，从他们的行为出发分析其是否及如何对环境或市场的变迁做出反应，同时从较广泛的程度上探讨这种行为的理性问题，借以初步阐述各种生态关系在小农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二 江汉平原的环境变迁

江汉平原坐落于湖北盆地中央，乃夹于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水之间的一块平坦地区。秦汉以前，江汉平原还是广袤的云梦泽。长江、汉水在进入云梦泽后流速减缓、淤泥沉积而形成大量形状各异的大小岛屿，泽地范围不断缩小并在宋代完全消失而留下数以千计的湖泊与小沼泽，江汉平原即属于长江、汉水共同冲

积和附近湖泊淤积而形成的湖积冲积平原（《荆江大堤志》，1989：15~16；《湖北省志地理（下）》，1997：1148~1149）。

长江、汉水每年都有3次汛期，即桃花汛（3~4月）、夏汛（5~8月）与秋汛（9~11月）。桃花汛一般并不严重，严重的是夏秋两汛，尤其是夏汛（宋平安，1989）；晚清时秋汛甚至危害更大，因夏汛消退快、水退后还可补种；而秋汛消退慢且难补种（张家炎，1993）。面对每年一度的洪水，堤防乃成为当地保护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这些堤防包括沿长江、汉水及其主要支流两侧的江堤及围绕各垸的垸堤。

江汉平原从东晋开始沿长江修筑堤防，汉水堤防则可能始于五代。这些堤防多由泥土夯筑而成、在重要地段也用石块垒筑，并建有涵闸以利灌溉与泄洪。至清代，江汉之水已渐被束于一线长堤之中。道光时沿长江、汉水的主要堤防已达1500多公里（张建民，1999：256）。这些堤防大小因地点变化而不同，其中以沿荆江北岸的万城堤（1918年以后改称荆江大堤）最大、最重要。以乾隆末期为例，万城堤的典型断面为堤顶宽19.2至25.6米、堤底宽48至54.4米、堤高4.8至7.36米（《荆江大堤志》1989：59~60）。由于荆江、汉水主河河床及沿江地势因泥沙淤积而不断加高，两侧的堤防亦不断加高。结果汉水、荆江（荆州段）在江汉平原先后演变成悬河（图1）。

江汉大堤之外还有数不胜数的垸堤。垸堤亦主要由泥土筑成，其规模一般要比江堤小，如乾隆中期汉川沔汉垸垸堤高约三至六尺、顶宽约二至五尺（《续行水金鉴》卷一五三页二十七上）。虽然水系的变迁与新堤防的修筑使得一些旧垸堤失去功能^①，但总的趋势是垸堤越修越多。垸堤内所围之田即垸田，其耕地以水田为主、旱地次之。垸（有的地方叫圩）的规模大小

^① 如潜江1870年芦伏河口坝筑成，致使全县227公里堤防（垸堤）失去功能（《潜江县志》1990：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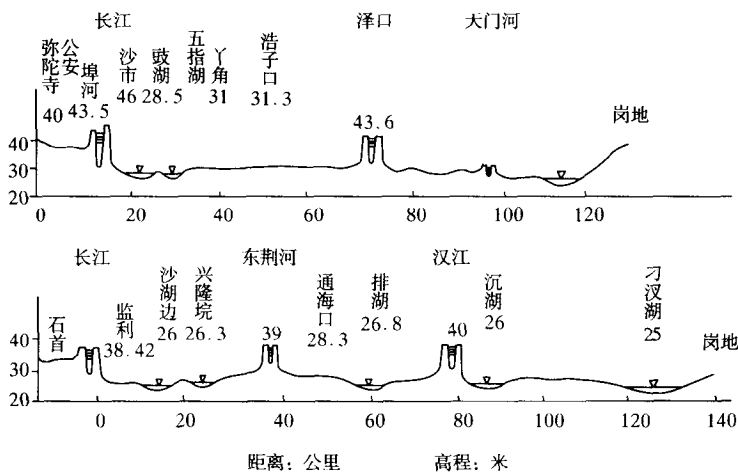


图1 江汉平原典型地段地形剖面图(《湖北农业地理》1980: 80)

各异，面积从不足千亩到大于十万亩不等（张家炎，2001）。一个大垸可能包围不少小垸，其垸堤亦相应地长短不等。典型垸田形状为碟形，它们呈蜂窝状地分布于江湖间隔区内^①。在大堤内垸田开垦趋于饱和之后，当地民众开始围垦大堤外的江滩洲地，是为“滩垸”或“洲垸”。滩垸的围垦始于明末清初，至清中后期则成为较普遍的现象（梅莉等，1995：120）。至道光时期，荆江两岸已是无段无洲、无洲无垸（《万城堤防辑要》，转引自梅莉等1995：200）。民国时期荆属南北两岸此类洲垸有百

① 20世纪初期的游记表明：“潜江、沔阳之地，凡临江襄二水者，皆筑外堤固不待言，即内地亦筑多数之堤，各部落包以堤防，名曰垸子。譬其形状，如置无数之锅，堤边最高，由此向中央渐低，恰锅底之处。”（引森田明，1974：27-28）典型的单个湖垸地形上表现为四周高、中间低、多以偏心圆向内坡降，内外落差只有2~4米，有的垸内还有积水，状如盆碟。有人视这种盆碟状蜂窝状湖垸复合体为江汉平原的生态特征之一。这种垸田内又分不同的微地貌，由高到低为庭园圈、旱作圈、稻作圈、涝地圈、水体圈等六种（监利新兴垸 [徐仁璋、杨明丽，1986]）。

余万亩（《荆江堤志》1937：卷四页十）。

虽有如此众多的大小堤防，但在1949年以前，江汉平原的大中湖泊均为通江敞水湖，亦即长江、汉水及东荆河与江汉平原境内湖渚并没有完全断开，湖泊水位随江河水位的涨落而变化。小型湖泊水位年变幅1~2米、大中湖泊3~4米，历年最大水位差则可达8~12米。因此一旦湖泊泛涨，滨湖地区即变成水乡泽国（《湖北省志地理（上）》1997：588~589）。这表明有沿江大堤并不能保证临湖垸田不受年度洪水泛滥的影响。就是垸内田亩，虽有垸堤可挡垸外面的季节性洪水（也不总是），却不能阻止垸内湖水上涨后淹没农田（渍水难排时尤其如此），多数垸堤也不能阻挡江堤溃口后的大洪水。实际上1949年以前江湖贯通、洪水漫溢的现象比比皆是。据1980年代的调查表明，当时占江汉平原主体的荆州地区每年汛期约有3/4的耕地处于洪水位线以下（《荆州地区志》1996：123）。也就是说，这些耕地基本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季节性洪水的影响。堤垸的增加又不可避免地占用泄水之区而加大了分泄洪水的困难。垸数增加与河床抬高均加重了对堤防的威胁，这一情况又因堤防管理不善而更加恶化，结果是堤防的频繁溃决。以万城堤为例，从其肇基的东晋至民国末年共有97次大的溃决，绝大部分发生在明清时期：明代30次（约9年一次）、清代55次（约5年一次）（《荆江大堤志》1989：67~74）。另有统计表明，汉水下游干支堤在1822~1967年的146年中共有73年发生溃口，其中1931~1955的25年中，有15年溃口，约5年3遇（《湖北省志地理（上）》1997：536）。这与汉水下游的水系紊乱及堤防管理混乱有直接的联系^①。于是每逢汛期，江湖并涨，垸内农田或因

^① 汉水因支河不断被堵而分流渠道日减、汉水含沙量大且易于淤积抬高河床，汉水上宽下窄的河道也严重影响泄洪量，加上汉水堤防质量又差，而管理又因涉及单位多及各种冲突多而极成问题，所以汉堤极易溃口造成泛滥。

决堤溃口而淹没，或因内水无法外排而渍涝成灾。

伴随这一现象的是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加。明清时期移民的不断涌入加上移民后裔及当地居民的自然增长，江汉平原人口增长很快。至清代它已成为两湖地区人口最多的区域（张国雄，1995：158）。然而耕地增加的速度却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以湖北全省计，人均耕地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3.03亩降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2.12亩再降至咸丰元年（1851）的1.75亩（梅莉等，1995：165）^①。考虑到江汉平原的高密度人口，其人均耕地的下降幅度应更大。

为了化解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当地人一方面继续向低湖地进军（围垦湖荒），一方面则随移民大潮前往沿边山区垦殖。这种垦殖引发土壤侵蚀，其流失的泥沙在江汉洞庭湖区积聚，一方面淤出新垦地，但同时缩小湖面、抬高河床。因此两者虽然都可以增加耕地面积，但同时却造成环境的不断恶化。加上堤防管理不善，结果造成江汉地区日益频繁的水灾（包括洪灾与涝灾）。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江汉平原的水灾从康熙朝的平均3.2年一次到乾隆朝的2.7年一次，再到道光朝的1.5年一次，频率越来越高（宋平安，1989）。洪涝灾害尤其是洪灾对江汉平原经济每每造成巨大损失。

随着堤防抵御洪水能力的降低及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对环境的反应效果也大打折扣。19世纪以前水灾之后农业生产尚可很快恢复，因水退迅速，当地人可迅速补种。19世纪中叶以后，水退不如以前快（因垅内水道淤积及垅外河床抬高），渍灾严重。在此情况下，即使小水亦可为灾。

^① 而据清末张之洞的观察，“假如八口之家，有田二十亩，糊口尚虞不足……”（转引自李文治，1957：208）也就是人均低于二亩半就不行了，而清代江汉平原水稻单产并无大的变动（张家炎，1991）。